



德国是如何帮助弱势群体的
那薇(2005.6)

社会救助——让人过有尊严的生活

在德国居留的难民，上世纪90年代每个月可以从德国政府得到700至800马克的补贴，比起他们的生活水平，我们这些领奖学金的学生真算是弱势群体了。到大学注册之前，我必须为自己申请一份比较便宜的医疗保险，因为德国的医疗保险，不仅是全民的，而且受法律约束。由于国家经费的支撑，越是穷人，越容易得到国家提供的医疗保险，不仅保费低，而且担保的项目还优惠。而公务员、私营企业家没有资格参加法定保险，他们必须参加私人医疗保险。我已经超过参加学生保险的年龄，四处奔波，到处碰壁。保险公司详细向我解释了两种保险的区别和应保范围，并且介绍我到社会局求助社会救济。所谓社会局类似于中国的民政部门，作为一个外国人，又是第一次跨进他国的社会救济部门，那份敏感和小心是可想而知的。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社会局官员态度和蔼，她们的言谈话语、神态表情丝毫没有让我感到困窘和羞辱，相反，还大大赞扬了我四十多岁才开始学德语，竟有要在几年之内拿下博士的勇气。她们的情感和坦诚使我觉得自己不是来申请社会救济的，反而是作为有功之臣来领取奖赏的。她们详细询问了我的有关情况，当时我的奖学金还未全额到位，经济收入当属贫困之列。按照德国法律，我不仅能够得到医疗保险补贴，而且还可以得到住房租金补贴以及购买服装的补贴，事后社会局寄给我一大摞的表格。在异国他乡去享受人家的社会救济，从感情上说不过去，我谢绝了社会局的好意。但社会局的宗旨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提供给您过有尊严生活的必要条件”。

这个宗旨让我感到很新颖，也很亲切。在德国享受社会救济，不用眼含热泪、千恩万谢、喋喋不休地念叨得到的关怀，而是把其当作享受做人尊严的必要条件，理所当然地接受，这完全不同于那种降低自己的地位和人格去摇尾乞怜的做法。

有尊严的生活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不少博物馆、体育、娱乐场所（如游泳馆）的入场券对于接受救济的人群有优惠。德国的工厂、企业也有责任为国家消除贫困分忧解难。法律规定：企业要招收一定比例有工作能力的残疾人。否则企业要多纳税。在一个计算机配件厂打工时，我认识了一位40岁左右的女工，有智力障碍，按部就班地干体力活，过了几年，我再次到这个车间，原来工作小组的女工朋友都已失业回家，只有这位女士还保有工作位置，只是改为打扫卫生而已。

德国对于在校大学生也有一套成熟的救助机制。人人皆知的Bafeg助学金就是按照家庭经济情况给予贫困生的贷款。大学生还享有非常广泛的救助项目，例如他们可以租住便宜的学生宿舍——单间，甚至多居室的单元房，大学绝对不为教职员工提供住房。学生可以参加法定的便宜的医疗保险；学生打工交的税每人每年在1.2万马克以下的，均可于第二年初得到退税优惠。

在德逗留几年，经常在市中心的豪华商厦前看到无家可归者。见得多了就发现了区别。中国的叫花子往往表现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作揖、下跪，口中絮叨着让人同情的话语。德国的叫花子身上穿的衣服虽然肮脏不堪，但从质地上看，绝对不是从跳蚤市场买来的旧货。尤其是鞋，少说也得100马克以上。他们的做派也让我感到好奇，在离身体很远的地方放一个破罐头瓶子之类的容器，与其说是讨钱罐，不如说是划地为限的界桩。在这块领地中，他们或坐或躺，背包、杂物凌乱地摆放在四周，身下铺着毯子，旁边往往还有一条毛皮光泽润滑的大狗。给这样的狗购买营养全面的罐头食品以及玩耍物品的也是需要一定数量钱的，再看这些老兄，绝对不作阿谀乞讨的表示，俨然一副看破红尘大爷的样子。对偶尔投过来的一枚枚掷盒有声的硬币，丝毫不动心，连头都懒得抬一抬。听德国人介绍，这些人都能从社会局领取足以维持生活的救济，只是他们嗜酒如命，讨点儿小

钱只为多买几瓶啤酒而已。

宽容与社会文明

德国是一个快节奏的社会，竞争激烈。上班族行色匆匆，绝没有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潇洒和悠闲，无家可归者却是街头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他们往往凑在一起，吹拉弹唱，哪里热闹，就在哪里取乐。弗莱堡大学地处市中心，没有围墙，没有校名标志，楼前是花坛，有一块空场。每天都聚集着十几二十几个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无家可归者，他们靠着教学楼的墙根，一边弹吉它、一边引吭高歌，好不悠游自在。他们的爱犬追来逐去，嘶咬打闹，好不热闹。

在德国人的观念中，人分三六九等，尊卑贵贱，每人自有独特的标准。大教授不会和穷学生交朋友。上等人清高孤傲，下等人同样孤独不群。但每一群人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只要不触犯法律，别人无权干涉。对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宽容也体现了对人生价值的尊重。这不禁使我想起无忧宫磨房的故事：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模仿法国凡尔赛宫修建的无忧宫，占地290公顷，座落在一个沙丘上，故有“沙丘上的宫殿”之称。沙丘上有一个古色古香的风车。陪我参观的德国朋友解释说：这个磨房当时属于一户农民，国王要征他的地皮，用以建造皇宫，虽然拆迁补偿是少不了的，但这户农民却故土难离，就连国王也奈何不了他。于是这户农民始终住在皇宫的园林中，从事他祖传的营生。我的德国朋友做了这番解释，还意味深长地问：“您是否感到不可思议？”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以尊重和保护个人合法财产为重要内容的政治文明，在两个多世纪前的封建普鲁士王国竟能够得到如此充分的体现。18世纪中叶，英国一位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这样形容过财产权对人的神圣性：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这就是常常被引为经典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宪政寓言。德国无忧宫山顶上磨房和风车能够保留至今也是对这一宪政原则很好的注释。

维护自尊的帮助

有一件事给我带来的温暖和启示，使我终身难忘。那是我刚到德国的第一个星期，我的先生在德国的另外一个城市，我的六岁的宝贝女儿寄养在刚刚认识才20天的北京人的家中上小学。那时电话还不像现在这样方便，写信是我与女儿和先生联系的主要途径。我当时住在波恩市郊山上的一个修道院里，虽然恍惚如置身于世外桃源，但到邮局却得走一个钟头。由于没有经验，事先就把邮票贴好了，兜里没装一分钱。德国的邮局是国家所有，邮局职员的工作态度之差在德国各个行业中名列前茅。一位先生拿过我的信，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叩上一个邮戳，随后他又漫不经心地把信放在天平上称了一下，冲着我说：“差一马克”。那时我的德语只会蹦一个一个简单的词，我对他说没有带钱，让我把信拿回去，明天再送回来。他说不行，因为他已经叩过戳了。并要求我在五点下班之前将一马克送来。当时已经四点过了，这一切让我感到非常为难，想到万里之外的期盼妈妈信件的女儿，那种沮丧和无奈真是无以言表。当我悻悻地跨出邮局时，一位刚刚在邮局中的顾客轻轻对我说：“您能够允许我帮助您吗？”说着从口袋中掏出一马克递给我。一马克对于德国人来说确实算不上什么，但他处事的得体和待人的诚恳，真是令我很感动。他帮助了我，既没有让我感到尴尬，又没有给邮局营业员难堪。一个帮助了我又给了我和其他人自尊的人，我将终生感念他。当我回到北京，走在大街上，碰到需要我帮助的人，我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因为我知道，一句亲切的话语，会让人感到这个世界仍有温情存在。

（《当代世界》2005年第6期）